

1701

武汉文史资料

1997年第1辑(总第67辑)



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武汉文史资料

1997 年第 1 辑

总第 67 辑

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2032/23

目录

武汉文史资料

1997年第1辑

· 政坛风云 ·

-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组织机构演变…… 涂天向 黄建芳(1)
“二·七”惨案罪魁祸首赵继贤伏法记 …… 施裕文(7)
武汉抗战初期的点滴回忆 …… 沈清尘(13)

· 人物春秋 ·

- 杂技表演艺术家夏菊花 …… 刘志斌(18)
李维格与汉阳铁厂 …… 余禄章(29)
汪日章和杭州国立艺专 …… 陈 桓(38)
我所知道的著名律师郭宗燮 …… 郭梓成(42)
武汉群众体育运动的发起者宋如海 …… 康志杰(50)
单口相声表演艺术家潘占奎 …… 万生鼎(53)
汉剧前辈艺术大师李春森 …… 万生鼎(60)
记武汉市儿童医院老院长徐文鼎 …… 陈剑函(65)

· 往事漫忆 ·

- 王杰与武汉新园林建设 …… 余开来(71)
我与《长江日报》的自办发行 …… 叶子健(75)
回忆伍能光领导武汉市渔业生产事略 …… 倪凌云(78)
五十年代干部理论学习热潮拾零 …… 吴仲炎(85)

封面题签 李 岩(武汉市政协主席)

· 遗闻轶事 ·

- 张学良与武昌珞珈山 巨成文(93)
- 陈叔通先生早年生活二三事 李曼农(95)
- 徐源泉军事之暇亦文亦商 许恺景(98)
- 孔昭润宋埠打洋人 许恺景(101)
- 何成浚与叶蓬 徐铸成(104)
-

· 文苑述零 ·

-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 朱生华(108)
- 旧汉口的湖北省新闻处和美国新闻处 新 文(120)
- 武汉沦陷时的报刊 恒 清(123)
- 旧汉口龙门联合书局汉口分局 舒兴文(129)
-

· 情系江城 ·

- 751 次鲜活货物专列开行纪事 段传立、王殿选(132)
- 与乒乓球有缘的林兴识先生 邝玉堂(137)
- 为中国食米文化再创新里程
——记香港实业家林兴识先生 胡雁冰、段 英(142)
- 女强人塑造“嫁接”之花
——记武汉荣泽印染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盼 肖俊超(147)
- 记热心教育的冯桢钧先生 刘进英(152)
-

·学运纪实·

- 武汉大学学运和重建党组织…………… 赵萌萌(154)
私立华中大学的社团活动和学运…………… 剑 琴(166)

·梨园旧事·

- 汉口京剧谈往…………… 漂泊客(171)
汉皋著名的京剧票友…………… 万澄中(194)

·社会百态·

- 旧汉口的水和热…………… 徐铸成(201)
旧汉口统一街黑市银元市场…………… 剑 琴(203)

·古迹名胜·

- 寻幽探胜道观河…………… 余文祥(206)
庐山《五百罗汉图》历险记…………… 王宪章(212)

·作者·编者·读者·

- 一部不可多得的地域文化史料
——评《长江中游风物选》…………… 杨建文(218)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 党部组织机构演变

涂天向 黄建芳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实行分共,随即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进行改组。8月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第23次常务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改组委员会,代行汉口特别市党部职权。会议指定曾集熙、李午云、刘叔模、赖特才、詹大悲、梁寒操、唐爱陆、李星亚、刘赓藻等9人为改组委员会委员。原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转入地下。8月7日,市党部改组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会,推李午云、梁寒操、刘叔模3人为常务委员,根据各部部长不限定以委员兼任的原则,推范遂予为组织部长,石信嘉为宣传部长,栗显运为青年部长,戚极捷为工人部长,唐爱陆为商民部长,刘蘅静为妇女部长,同时决定汉口市各级党部及所属群团组织即日停止活动,听候改组。8月9日,在改组委员会第二次常务会上,常委梁寒操辞职,推曾集熙为常务;宣传部长石信嘉辞职,以朱云光代之;并决定重新登记党员。8月9日,市改组委员会委员通电就职,正式接收市党部。10日正式对外办公。8月12日,市党部改组委员会组织部开始派人接收各区党部,限期一周完成。全市25个区党部分别由邹石安、张建勋、刘培誉、万钧等10余人接收。15日,各区党部亦派员改组了所属区分部,19日完毕。随即着手全市区党部的组建工作,其具体步骤是:首先由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向各区分部摊派一人总负责,另摊1至

2人为助理成立各区分部,然后在新成立的各区分部的基础上成立各区党部。10月,全市各区党部基本建立,总数由原来的25个减少到11个,党员人数由近3万人锐减至6千余人。通过改组,汪精卫集团清除了汉口国民党组织内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把各级组织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1927年10月宁汉战争爆发。10月下旬,汪精卫潜往广州。11月中旬,唐生智兵败下野,桂系军队占领武汉,南京特委会派来党务整理委员会,准备接收汉口市党部。市党部改组委员会陷入困境。11月16日,市党部改组委员会一方面宣布“工作停顿”,同时又声称“为了使市党部的党务工作不至中断,17日下午,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在汉口三新街宁波同乡会馆召开执监联席会议,讨论如何维持本市党务进行办法”,以与桂系相抗衡。为此,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采取外变内不变策略,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举行“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市党部领导机构,并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整理党务临时委员会”。11月20日,市党部临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按选票多少推选张敷、陈雨苍、鲁三民为常务委员,推洪本桑为组织部长,邱致泽为宣传部长,唐爱陆为商民部长,李芳园为工人部长,李星亚为青年部长,胡兰畦为妇女部长,黄炳为书记长。会议还决定“原改组委员会委员可以改组委员的资格参加整理党务临时委员常务会议”。21日,召开党务临时委员会,增补唐爱陆为常委,并决定召开全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汉口特别市党部。

1927年12月4日,在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程潜和国民党湖北元老孔庚、李书城等人的支持下,国民党汉口特别市第三次全市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78人,会议选举产生了以范遂予、郑震宇、洪本桑、胡兰畦为中心的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不久,程潜遭桂系排斥,武汉完全落入桂系手中。刚成立的汉口特别市党部名存实亡,市党部执委成员纷纷逃离武汉。

1928年4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规定各地党部一律停止活动,由国民党中央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员进行考察、训练和重新登记,限期3—4月完成。同月,桂系组成汉口特别市党部指导委员会,成员有涂允檀、林逸圣、陶钧、麦焕章、孙绳、严重、李翊东,推涂允檀、林逸圣、陶钧为常务委员,由涂允檀任组织部长,麦焕章任宣传部长,孙绳任训练部长,并组织民众训练委员会,孙绳兼主任,陶钧、林逸圣、涂允檀、麦焕章为委员。指委会成员多为桂系实权人物。不久,李翊东调宜昌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王建五来汉任指委会委员。但王是蒋系人物,受到排挤而离去。市党部指导委员会在接收市党部后,立即指定各区党部指委会委员:第一区党部为鞠百川、周文颐、童仲庚、余东俊、姚宝善;第二区党部为彭开智、廖化平、孙汉文;第三区党部为王嗣会、杨在霖、田维中;第四区党部为钱昌义、郭一伟、许还生;第五区党部为周文冕、任朴之、肖士猷;第六区党部为刘素行、宋训信、陈之光;第七区党部为彭象贤、刘鸣皋、石静候;第八区党部为陈衍庆、龙取直、李维汉;第九区党部为汪磊、黄警凡、吴宪;第十区、十一区党部指委会委员姓名不详。市党部指导委员会在继续清洗基层组织中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同时,还大加排斥汪精卫的改组派。为了完成这次清洗工作,市党部指委会与省党部指委会联合创办了“党训班”,培养党务骨干。对全市国民党员进行登记,至8月20日完毕,共登记党员6665人,区党部仍为11个。1929年2月,桂系成立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要负责人仍是林逸圣、麦焕章、陶钧等桂系军人。

1929年3月蒋桂战争发生,4月桂系失败,蒋系中央军进入武汉。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会以湖北省、汉口特别市两党部违反纪律为由,解散省市党部,全体党员重新登记分别去留,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指导委员会结束。4月2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以第2号训令命邱鸿钧、官全斌、蒋坚忍、陈希平、王怡群、查光佛、蔡

受之、曾集熙、王云圃等 9 人，组成汉口特别市党务临时整理委员会，由邱鸿钧、查光佛、曾集熙等 5 人为常务委员。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秘书处常务委员为查光佛、王云圃、邱鸿钧，秘书郭寄生；组织部长王怡群，秘书艾时；宣传部长查光佛，秘书王献芳；训练部长陈希平，秘书陈荣珪；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委委员蔡受之，秘书柯愈珊；财务委员会委员王怡群，秘书汪樾。不久，曾集熙、查光佛等人辞职，改由庞镜塘、刘云、萧若虚接替。1930 年，邱鸿钧、蔡受之等因受排挤辞职，改由单成仪、黄文初、闻钧天组成常务委员会。约在 1931 年前后，市党部机构调整，改部为科，组织科主任萧原清，宣传科主任周介天，训练科主任杨冰，书记长为蔡树中。

临时整委会成立之初，仍沿袭桂系指委会之作法，设立 11 个区党部，各区党部常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分别为：第一区党部王云山、张义胜、康小山；第二区党部敖长焕、文福清、柯毕藩；第三区党部蓝百川、柯庭、胡摩尼；第四区党部曾广开、彭开智、廖代平；第五区党部杨在霖、倪无丙、田维中；第六区党部杨文玉、任朴之、泽孝珊；第七区党部黎先治、虞肇华、李希白；第八区党部周绍文、杨宗文、陈新泽；第九区党部不详；第十区党部刘勋成、吴福祖、陈之光；第十一区党部高晴、来炳、李经改，共 170 个区分部。1929 年底，进行区党部调整，共设 8 个区党部，一个直属区分部，共有党员 5612 人。

1932 年冬，市党部临时党务整理委员会报请国民党中央，于 1933 年初举行全市党员直接选举，成立新的执监委员会，获国民党中央第 51 次常会同意。1933 年 1 月 20 日，国民党中央派方觉慧、曾扩情为监选员来汉监督选举。由于方与临时整委会负责人单成仪等人有矛盾，怂恿支持受到排挤的原临时整委会成员邱鸿钧、蔡受之等人操纵选举，排斥单成仪、黄文初等当权派。结果，邱鸿钧、陈绍平、戴经尘、单成仪等 12 人当选为市党部执行委员和候

补执行委员,李经世、蔡受之、任汉臣、周小溪、王河清当选为监察委员,原市党部临时整委会委员大多落选。由于这次选举明显的徇私舞弊,引起国民党中央的重视,中央党部第58次常会认为“汉口市此次选举,纠纷复杂,舞弊捣乱,确有未尽合法之处”,应宣告无效。汉口特别市党务临时整理委员会终止。

1933年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指派李范一、贺衷寒、陈希曾、吴绍澍、彭绍贤等5人组成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旋即彭绍贤辞职,国民党中央指定单成仪、杨舆勤、胡国亭为整委会委员。3月27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接收汉口特别市党部,4月1日正式对外办公,由单成仪、吴绍澍、杨舆勤为常务委员,郭衡任书记长,杨鸾和任秘书。同年吴绍澍、杨舆勤辞职,改梅公任、江述之为常务委员。1934年,陈希曾辞职,增选陈乐三、周炜方为整委会委员。整理委员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训练4科,分别以陈之光、林荣葵、刘文柱等人为科主任。市党务整委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改建区党部、区分部,全市共辖8个区党部和2个直属区分部。其具体原则与步骤是:先改选区分部,后建区党部;按照党员分布状况,每个区党部下辖10个区分部,每个区分部党员人数约在30~50人之间。改造工作从6月开始,至8月24日结束,选举结果如下:第一区党部常务委员王云山,第二区党部常务委员任汉臣,第三区党部常务委员余增秩,第四区党部常务委员汪绍华,第五区党部常务委员阎夏阳,第六区党部常务委员周道生,第七区党部常务委员朱三升,第八区党部常务委员孙子汉,直属第一区分部常务委员李书裕,直属第十二区分部常务委员吴文。全市共计80个区分部,正式党员3791人,预备党员1345人,总计为5136人。

1936年3月,根据国民党中央之命令,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设计委员会成立。4月1日,正式接收前党务整理委员会,对外办公。设计委员会实行特派委员制,特派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泮岭担任。设计委员有江述之、胡国亭、陈乐三、周炜方、陈

希曾、谢澄宇、谢承炳，书记长郭衡。其后，相继增补张以焜、陈独真、范春阳、叶楠、胡越、林尹等为设计委员。市党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民训 4 科，分别由范鸿渐、陈之光、林荣葵、刘文柱为科主任。下辖 8 个区党部和 2 个直属区分部，其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为：第一区党部为王去山、唐小山、容之光、李辉光；第二区党部任汉臣、柯华阶、张善之、邹顺堂；第三区党部余增秩、胡元寿、周桂荣、黄明第；第四区党部汪绍华、邹勋、李德恒、谭健夫；第五区党部阎夏阳、詹肇华、张培德、李希白；第六区党部周道生、田种玉、黄忠堃、童幼卿；第七区党部朱之升、邓耀松、杨宗文、王文彬；第八区党部孙子汉、陈之光、来炳；直属第一区分部李书裕、李国华、施博；直属第二区分部吴文、肖国华。全市共有 115 个区分部，正式党员 3780 人，预备党员 2044 人，计 5824 人。至 1938 年夏，连同预备党员共 4210 人。

1938 年 9 月，武汉沦陷前夕，国民党中央对汉口特别市党部进行改组，特派员陈泮岭及大部分原设计委员会委员撤至湖北恩施，后转至重庆，书记长郭衡及少数设计委员撤至宜昌。同时另外组建以林尹为主任委员的市党部，执行委员有杜则尧、王河清、潘仲素、杨虔州、欧阳良焱、吴芝生、田新安等，书记为先大启。这是一个党特合一的组织机构。日军占领武汉后，大多数市党部执行委员或被捕，或逃亡。汉口特别市党部名存实亡。

“二·七”惨案罪魁祸首赵继贤伏法记

施裕文

血债血还

解放初期,反革命势力猖狂,镇压反革命乃当务之急。1951年7月16日,武汉市人民法院在汉口江岸车站附近召开公判大会,公开审判了镇压‘二·七’罢工的罪魁祸首赵继贤。会场正中挂着“京汉铁路工人控诉‘二·七’惨案祸首赵继贤罪行大会”横幅,左边挂着林祥谦、施洋烈士遗像,右边挂着葛树贵、吴珍、刘寿真烈士遗像。到会的有武汉市各界代表和郑州、石家庄、长辛店、太原等地的铁路工人代表以及烈属代表等,约近万名。陪审员是李尔重、李冬青、谢滋群、刘实、陈秀山、陈铭枢、马哲民、林厚周等26人。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参加了大会,武汉市人民法院院长张雪涛担任审判长。宣布开庭后,市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吴杰宣读起诉书。接着由林祥谦烈士的爱人陈桂贞等8人进行了血的控诉,“28年前的深仇大恨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得报了”。“‘二·七’罢工的血债今天就是要算一算”。他们悲愤交集,怒发冲冠,纷纷要求枪毙赵继贤。陈桂贞控诉说:“我夫林祥谦被捕后,反动派逼着他下令复工,我夫不从,又把其弟捉来,当面把其弟砍死了。因我夫还是不下令复工,也被活活地砍死了,还不准收尸。我夫的父亲第二年也被工贼踢死,就这样我一家被杀死三口人。现在要求政府替我报仇。”梅才泳烈士的爱人控诉说:“我结婚不到一个月,我夫

被枪杀了,逼得我没有办法当了尼姑。今天我的仇得报了,我要参加学习,不当尼姑了。”并当场脱了尼姑服,换上干部服,群众掌声雷动。在庭讯调查中,审判长宣读了当年赵继贤拍给军阀吴佩孚关于镇压罢工的电文。赵犯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招认:“全路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当时我电告吴佩孚请转饬郑州维持秩序,如有越轨,即行设法制止。”并承认他应对镇压“二·七”大罢工负主要责任。最后审判长宣判了赵继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继贤所有财产除留家属生活费外,全部没收。宣判后,市长吴德峰、市委副书记谢邦治讲了话,接着全国铁路总工会梁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赵敏和太原、郑州以及江岸铁路工人代表也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会后立即把赵继贤绑赴江岸车站林祥谦烈士原来牺牲的地点就地枪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罪行累累

赵继贤早年在北京京师政法大学毕业时,正值军阀割据时期。他因善于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得到军阀吴佩孚、曹锟的赏识,倍加重用。他先后被任命为京汉临时军用管理局局长,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法处处长,保定陆军稽查处处长等职。他效忠于军阀,仗势欺人,本已恶贯满盈,1922年1月正式接任京汉铁路局局长后,更是变本加厉。他订出一套压榨工人的制度,如察觉工人在冬天烤火就罚钱,规定每天工人工作至少10小时以上,迟到一次就罚钱或记过,迟到两次就开除。工人因吃不饱要求加薪,他说:“工人叫他们吃饱了,就不干活了,非得叫他们挨饿不可……。”1922年4月,由于得到英、美支持的吴佩孚和受日本扶持的张作霖之间矛盾激化,爆发了直奉战争。赵继贤为了筹集军费供吴佩孚打内战,竟克扣工人工资。每月只发工资的3/4,致使铁路工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悲惨的非人生活。当时,工人们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成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猪穿如柳。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

头!”

京汉铁路工人为了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会筹备会于1923年1月5日在郑州开会,决定2月1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当时曾报告赵继贤,赵当面假意允许,但暗地里又电告吴佩孚。吴即电令驻郑州、信阳的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内称:“顷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径电云:‘……未经地方官厅许可,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务祈麾下迅飭予为防患,切实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即饰予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等语。于是反动势力甚嚣尘上。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带武装警察到总工会,制止工人开会。2月1日,工人代表整队向会场普乐园进发,受到荷枪实弹的军警阻拦。当时工人们奋不顾身,冲进会场,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而反动军阀竟以武力强行侵占总工会会所,后又包围了代表所住的旅馆,搜劫工会文件和财物,逮捕并毒打工人,捣毁各团体赠送总工会的礼物匾额。当晚,总工会决议,2月4日中午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并决定把总工会移到汉口江岸办公,同时发表宣言,提出撤换赵继贤、冯云、黄殿辰,赔偿损失等五项要求。赵继贤一面指使冯云(京汉路江岸办事处处长),一面通过吴佩孚密电湖北督军肖耀南,派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强迫总工会交出工会委员,激起群众愤怒,列队游行示威。张厚生于2月7日下午5时,带了两营士兵,分三路包围总工会,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工人纠察队长曾玉良、梅才泳、胡兴顺等37人,受伤的有陈大发等27人。当时军队还包围了工人宿舍,逮捕工人。共产党员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时被捕,被绑在车站电线杆上,张厚生逼他下上工命令,喝令刽子手砍一刀问一句:“上不上工?”林断然拒绝:“不上!”张再令砍一刀,并声色俱厉地问道:“到底下不下上工的命令?”林愤然回答:“血可流,头可断,而工不能复!”林祥谦被砍七刀而壮烈

牺牲。共产党员、大律师、铁路总工会顾问施洋也同时被捕,2月15日慷慨就义于武昌。

赵继贤于2月5日在京汉铁路北段长辛店发出布告,限工人12小时内复工。同时又从保定和琉璃河调来十四混成旅,强迫运来新工人126名,另挑选500士兵,加紧训练开车,准备用以接替工人。并宣布,工人如不复工,一律押解出境还要追缴以前的薪饷。随后又下令缉捕工会委员及其他职员。当晚搜查工人宿舍,捕去史文彬、陈励茂等11人,严刑拷打,并准备押送保定。

次日,工人群众3000多人齐集军营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被反动军营开枪扫射,继以马队践踏,当场打死葛树贵、杨诗四、辛克洪等3人,伤30余人。

嗣后赵继贤为了掩盖罪责,竟歪曲事实,说是“工人以手枪和士兵冲突,致遭伤亡,”以此混淆视听。同时派兵强迫工人上工,否则“就地正法”。对受伤的工人不准出境,不准就医,还将为工会办事的员工开除,并且向家属追缴薪饷。赵继贤又将全路被捕的工会委员等26人解到保定,并亲自刑讯。致使吴珍等3人因惨遭折磨死于狱中。

逍遥法外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1926年夏,革命军出师北伐。10月攻占了武汉,消灭了北洋军阀二万多人。从此,吴佩孚一蹶不振。树倒猢猻散,赵继贤夹着尾巴逃窜了。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处于困难时期。在蒋介石的保护伞下,赵继贤竟安然无事了,他便将搜刮人民的钱财,在京、津、苏、沪一带,大置田地577亩,房屋六幢,有的房屋雕龙画凤,富丽堂皇,外有红墙绿瓦,内有亭台楼阁。像通关坊一所是购自前清一个大官僚的房子,群众称为“赵公馆”。当时赵继贤成了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人家,过着奢侈豪华的腐朽生活。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赵继贤感到不妙,即改名

换姓,突然出走,隐居起来。其大儿子赵世清还在新闻报上登报声明,脱离父子关系。解放以后,赵继贤想变卖田地房屋,妄图逃往香港,但一时没有找到买主,后又因广东深圳出境困难,遂滞留了下来。

插翅难逃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了。因公安机关刚刚建立,对赵继贤其人的所作所为并未掌握,因此,无人过问赵继贤的行踪。

1950年初,中央公安部发出通报,列出赵继贤的简历和罪恶,指出他就在苏州,要求公安机关缉捕。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处长丁兆甲觉得案情重大,决心侦破此案。他除了向苏州市公安局布置任务外,还直接把苏州市公安局中区分局调查股股长高其智找来,对他说:在“二·七”罢工中不知有多少烈士牺牲在赵继贤手里,而他现在就在苏州,我们一定尽快侦破。高其智当时才23岁,正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时候,当他听到这个情况后,马上立案侦查。他们首先派人打进通关坊赵继贤的“公馆”里侦查,赵在逃离此住处之前仍用赵继贤的名字,但找不到赵继贤其人,却发现了赵继贤之子赵世清。后又继续侦查一段时间,仍找不到赵继贤的下落。他们分析,其子赵世清可能知道,但一时无从下手。

1951年5月初,获悉赵世清有赌博行为,且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连长级职务,因此,把他逮捕起来。在审讯中要他交待他父亲的去向,否则就罪上加罪。他战战兢兢地说:“我知道我被捕的原因,主要是掩护反革命分子罪。”遂讲出其父亲的住址:苏州阊门西街34号或36号,化名赵博学,还把其父的特征也供述了。经过进一步查实,在阊门西街34号的一座楼房上,住有一个老头子,他在派出所报的天津一段简历历史与中央公安部通报吻合;群众也反映这个老头子从不下楼,一切事情多由他的老婆出入办理。因此,初步认定这个老头子就是赵继贤了。当丁、高二人登上这个

老头子住的楼上时,长期深居简出几乎与世隔绝的赵继贤,突然看到有两个陌生人进来,行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丁兆甲指着他家里供奉的一个小佛说:“你修行修得太晚了!”这句话就象晴天霹雳,把赵继贤震得呆头呆脑,看来他再也隐瞒不住了,于是采取能推即推的办法,连忙说:“过去的事情都是吴佩孚、肖耀南干的。”好,已经对上号了,不需再多问了。丁兆甲直接了当的说:“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去说清楚就是了。”赵继贤逍遥法外 28 年的历史结束了,终于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他在解放前夕的“突然出走”,其实并未离开苏州,而是化名赵益三住在侍其巷 72 号。后又移居上海康平路 102 号,化名赵伯宣。1950 年 3 月又从上海返回苏州匿居于阊门西街 34 号。但在解放了的新中国他是插翅也难逃的,终于落网了。

赵继贤一案因属全国特大案,中央指示,需在郑州、汉口两地宣判。赵犯被捕后,即转送河南公安厅,先由河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然后又转到武汉审判并执行死刑。血债要用血来还,赵继贤这个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在人民取得政权后,终于被依法严惩,这就是赵犯的可耻下场。